

清华往事

○周鲁生（1969届精仪）

1963年，我从南宁二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那年因全国许多省份发大水，道路阻断，火车往返绕道了七天七夜才从南宁到达北京。当疲惫的我拎着南方特色的梯桶等行李走进清华园时，“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顿时使我振奋起来。而在开学初的全校新生大会上，清华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更让所有的同学激奋不已。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马约翰教授身着佩戴蝴蝶领结的短装，边演讲边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跑步示范的场景。

我分在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光学仪器专业，班号光九，全班33人，其中女生3人。光学仪器专业是1958年新建的专业，有许多新鲜内容。比如“莱塞”（激

光英文laser译音），大家第一次听说时满怀十足的神秘感、新奇感。系里给班里配了一台光学仪器——照相机，它为我们光九拍照留影服务了数年。

进校伊始，清华就十分强调学生要重在掌握学习知识的技能。老师在课堂上用了一个“干粮与猎枪”的比喻，即：老师授给的干粮（知识）总有一天会吃完的，但是授予猎枪能打猎物，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知识。后来看到有校友回忆授予“鱼”和授予“渔”之说，寓意是相同的。我们每天奔走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吃粮习猎”乐此不疲。

印象中，第一次开卷考试既紧张又兴奋，好几个班集中在大课教室，第一个交卷的是我们光九班的男生。印象中，我们宿舍里住着六个女生，一张大桌子放在三张架子床中间公用；星期天舍友们都到图书馆占位去了，我一个人留下独享大桌。印象中，当时的饭票比例是40%的细粮（馒头）和60%的粗粮（含20%的米饭，可是经常抢不到），有些男生不如女生会“精打细算”，常常到了月末顿顿啃窝头。

学校设有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文体活动非常活



光九班毕业合影

□ 值年园地

跃。班里有参加校京剧队的、军乐队的、弦乐队的、交响乐队的，还有加入校广播台的。爱好歌咏的我考上了清华合唱队，但只参加了一次活动，就被动员到了清华体育代表队投掷队，皆因之前我参加新生运动会投掷项目得了个小名次。从此，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后，教练和老队员们带领我和队友们在西大操场训练。

1963年底至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直接的体现是，入学一年后许多同学的体重都增加了，我长了十几斤，系里一位苗条的舞蹈队的女生据称长了20斤。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半夜里号外消息满天飞，大家从被子里爬起来游行欢呼。

期末，大一学生都要参加一个月军训。我们班分在天津杨柳青当工程兵。夜行军、打靶、点炸药包、扎浮桥等，全是



1964年投掷队部分队员在礼堂前草坪合影。左起，前排：王显周、仇君抗、储闻韶、苟显万；后排：刘振鹏、周鲁生、陈熙、□□□、钱振球

真格的，只是没穿军装。在结束军训的军民联欢会上，我们班一个男生上台表演“女高音独唱”大受欢迎，被团长拽着不让下台再来一个。

1964年暑假期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排练，选调了多所院校的大学生参加伴唱群演，我们班的一名女生也在其中。我暑假结束返校之后，她给了我一张票，夜晚到大会堂观看《东方红》的彩排，我看到了精彩壮观的演出，还有幸看到了亲自组织指挥排练的周总理坐在前排。

一年后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体育代表队，并搬到代表队宿舍居住。清华非常重视体育代表队，重视田径队。一年一度的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来临前，要召开田径队赛前动员大会，会给予一线队员从思想到伙食的特殊优待。分管体育和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还亲自找各队干部个别谈话，了解情况鼓舞士气。我担任投掷队团支书时，曾被约谈话作赛前汇报。

清华田径队连年获得男子、女子团体总分第一，赛后蒋南翔校长（兼高教部长）亲自为田径队摆庆功宴致贺词，其时群情高涨，欢欣鼓舞。

在学校的重视下，清华体育代表队组织了许多旨在提高代表队员思想和体育素质的活动，如：组织代表队员在学校大礼堂观看纪录片，看大松博文教练如何魔鬼式训练日本女排；提出贯彻“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组织代表队员学习徐寅生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讲话，徐在讲话中说是到女队“放火”来了，要女队思想过硬敢赢，不惧怕外国选手；组织代

表队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乒乓球队世锦赛取得优异成绩的庆祝活动，接受教育鼓舞。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令我记忆深刻。清华体育代表队的女队员被指定作为女民兵参加集会，住在投掷队的女队员们尽在其中。那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打着“清华大学”横幅的清华师生排在人群的最前面。我们女民兵作为排头兵排成两排，肩扛“五尺枪”英姿飒爽地站在天安门和金水桥之间。天安门城楼离我们如此之近，仰头即可清晰地看见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着或走动着的样子，看见郭沫若手持讲稿一字字、一页页地念着支持亚非拉革命的声明。

1965年，医院终于查出我在新生运动会比赛受的伤是右膝半月板撕裂（和前十字韧带断裂），大二暑假我到北医三院手术切除半月板。但手术后终于没能瞒住母亲，母亲焦急地请假来到北京。队友们陪着母亲和我照了一整卷照片，留下了许多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1963年的新生运动会是我入学后唯一的一次参赛。我受伤后很久都没有查出伤情所在，训练时又继续不断地受伤，训练成绩也始终上不去。之后几年的高校运动会，我都是做后勤服务，挎着装有巧克力等补给的书包，到各个赛场分发给参赛队友，当啦啦队，分享队友的喜悦。虽然教练和队友们一直在鼓励我，我还是觉得练不出来压力大，很苦恼，希望告退回班。队里的团支书和党员做我的工作，要我安心留队发挥作用，于是我继续留下来做铺路石。1964年起，清华四、五、六年级的高年级学生轮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

代表队也不例外。1965年，我接任团支部书记，同年11月，我在代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下半年教育革命，“九字班”开始缩短学制为五年半，部分专业试点“勤工俭学”，我们班也在其列。我们边上课边在9003系楼里为高年级同学毕业设计作辅助工作，我和几个同学曾编在一个小组测电阻、测电容、测晶体管，每人每月发给8元钱生活补贴。

这一年对文化界、文艺界的政治批判愈演愈烈。我们在东大操场看的露天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都属于被批判之列的大毒草。政治批判之风刮到校园的每个地方，清华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6年6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校园里地覆天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处处激烈辩论的人群，派来不久又撤离的工作组，“红卫兵”“血统论”“黑五类”“红五类”，批斗老师，批斗学生，批斗“走资派”，抄家，游街，大串联，武斗，所有的角落所有的人群都被动员起来。热情高涨而疯狂的人们在为“捍卫革命路线”而“战斗”……

我们“九字班”于1968年底毕业分配。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华共有从1960年到1963年入学的四届学生先后毕业分配。此时“文革”依然如火如荼，大学生被作为“臭老九”分配到各地接受“再教育”。

“文革”是个极大的奇迹，它把举国上下数亿人口全都运动起来参与“革命”，在全世界可谓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文革”是巨大的愚昧和灾难，但愿在全世界都不要重演。